

论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对庾信的推崇

黄妍 徐国荣

摘要: 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在明清时期诸多古诗选本中表现出对庾信的特别推崇,称许其性情至深,才气横溢,尤重其使“辞”之能,作为其诗学观“情辞并重”的典范,并从诗品与人品方面就历代对庾的批评给予辩解。在论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中,强调庾信“前代之师”的地位,甚至认为杜对庾之五言“亦趋亦步”。这样的推崇与编选者的身世经历和诗学观念相关,也是陈氏意为为六朝诗正名以及建构六朝诗史的一种手段。

关键词: 陈祚明 《采菽堂古诗选》;庾信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5019(2014)01-0061-06

作者简介: 黄妍 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;徐国荣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文学博士(广东 广州 510632)。

陈祚明是清初诗文选家,其所编选的《采菽堂古诗选》(以下简称《采菽堂》)是一部较为大型的古诗选本,选录汉至隋代的古体诗歌,在明末清初众多选本中

别具特色。其中他对庾信尤为推崇,在个人诗篇的选录数量上列为第一。我们先来比较明清几个著名古诗选本所选庾诗的情况:

选本	古诗归	古诗镜	古诗评选	采菽堂古诗选	古诗笺	古诗源	古诗赏析
数量	9	49	27	232	16	14	8
名次	八	三	六(与曹植并列)	一	十(与吴均并列)	八	八

在入选数量上,《采菽堂》选入庾信作品 232 首,是入选诗作数量最多的作家,远远多于其他选本;庾信存诗较多,单从绝对数量上或许未能完全反映出位次先后;再从入选比例来看,陶渊明存诗 122 首,《采菽堂》除《联句》以外全部入选,比例为 99%^①,庾信存诗为 251 首,比例为 92.4%^②,位列第二。陆时雍《古诗镜》所选庾诗数量也位居前列,但对庾信的评价却并不高,如谓其“诗情浅薄,不乏俊句,然无远韵远神。清练不及肩吾甚远”^③,认为庾信并不如他的父亲庾肩吾。在具体诗作评点中,也多有贬语“语无灵气”、“皆为死语”、“此是死句”、“此是拙句”^④。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

虽认为庾信“性正情深”,“发为长歌,雅称至极”,但“乃于五言一宗,余虽不敏,不能曲护贤者,而谓非破坏诗体之咎府也”^⑤。认为庾信的五言诗为破坏诗体的罪魁,批评比较严厉。相较而言,《采菽堂》对庾诗表现出特别的称赏,《凡例》中七处提及庾信,选庾信诗 232 首,有点评的 224 首,无一贬词。而且,他不仅将庾诗当作情辞并重的典范,还常对批评庾信的意见予以辩解,可谓青眼有加。这种与众不同的选取眼光和评价标准,既与选者的审美趣味、思想经历密切相关,也反映当时诗学思潮的变化,对清代后来的古诗选本与庾诗评论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,值得我们深入挖掘。

① 因《采菽堂》选诗以冯惟讷《诗纪》为蓝本,故诗人存诗亦以《诗纪》为据。本文统计据冯惟讷《诗纪》,影印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6 年。

② 《采菽堂》依《诗纪》体例,另卷列出庾信所作郊庙歌辞 35 首、燕射歌辞 18 首,此类诗不作统计。

③ 陆时雍《古诗镜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 471 册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 年,第 319 页。

④ 陆时雍《古诗镜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 471 册,第 320 页。

⑤ 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卷 5,张国星校点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7 年,第 290 页,另参见石朝辉《论船山诗学中的情与理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12 年第 3 期。

一、情辞并重的典范

陈祚明《采菽堂》论诗情辞并重,在《凡例》中明确指出“诗之大旨,惟情与辞。”^①评庾信《鸡鸣》篇“但觉淋漓古雅。古雅,辞也;淋漓,情也。”此论是有针对性的,目的在于矫正复古、竟陵二派之弊。在《凡例》中,他认为,复古派弊病在徒模拟字句而乏己之真情:“已实无情而喋喋焉,繁称多词,支支蔓蔓……厥要弊,使人矜强记,采摭剽窃古人陈言,徒饰字句,怀来郁不吐,志不可见,失其本矣。”而竟陵派为反拨复古派,“因崇情刊辞,即卑陋俚下无所择,不轨于雅正,疾文采如仇雠。”过分强调情而不注重辞采的锻炼,又陷入另一个极端:“失情而崇辞,辞无所附;失辞而并失情,情又无由宣,诗之亡在此二族矣。”为此,陈祚明提出要调和二者,“予之此选,会王李、钟谭两家之说,通其蔽,折衷焉。其所谓择辞而归雅者,大较以言情为本”。情为本,辞须雅,因此,在选择典范时,便会综合考虑情与辞两个方面能否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。

陶渊明是《采菽堂》中入选诗作比例最高的诗人,然其诗作并非一开始便全部入选“始选陶诗,舍置十许篇。及后覆阅,又登七首于续集。壬子冬,再览一过。公诗自成千古异观,如古器,虽有衅文,不伤其古,无一首可删也。乃尽载正选中。”(1591册,80页)可见对陶诗的择取经历一个过程。对陶诗的择取,一方面延续了宋代以来对陶诗的重新定位和评价,其次是出于对陶潜高洁人品的肯定。陶诗情感真挚,格高调古,符合“情深”的要求。但陶诗纯以胸臆之语发之,平淡自然,不重雕琢锤炼,无法可循。故虽列为首位,但并未完全吻合陈氏理想的诗学典范。《采菽堂》中入选比例和评价有时并非完全一致,如陆机入选95首,但在评点中却对陆诗评价不高。因为在他看来,虽然陆诗“在法必安,选言亦雅,思无越畔,语无溢幅”,遣词造句合于雅道,但“造情既浅,抒响不高”,“大较衷情本浅,乏于激昂者矣”(1591册,38页)。认为陆诗缺乏深情,故评价不高。相较而言,谢灵运入选诗作虽然不如陆机,但所获评价却远高于他。陈祚明对谢灵运的称赏主要在其物色技巧之生动高妙:“其钟情幽深,构旨遥远,以凿山开道之法,施之惨淡经营之间。细为体味,见其冥会洞神,蹈虚而出。结想无象之初,撰语有形之表。”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用心构思,刻意结撰,惨淡经营。但又不同于贾岛等人的刻苦窘迫,能“洞神”“蹈虚”,故“智慧如此,所证岂凡?洵可称诗中之佛”

(1591册,137页)。许之诗佛,评价不可谓不高。但谢诗之情又往往为其辞所掩,故综合而论,庾信诗歌才是最符合陈氏诗学观的理想典范。

庾信性情较为深厚,同为流寓北方,王褒等人“荷恩眄,忘其羁旅焉”^②,家国遭际似乎并未带给他们太多的苦痛。庾信则不然,家国的痛苦、屈仕的悲哀始终萦绕伴随他的后半生,如此沉重的情感重荷发之于诗,则全是性情,无复构思之迹,自然比王褒“夏蝉经秋,独树孤吟”的单薄,远为深刻浑厚。庾诗既有深厚情蕴,又音律和谐,词藻雅丽,构思巧妙,使事无迹,情深辞雅,因此得到陈祚明的特别推崇。他不仅在《凡例》中称扬其深情“子山之伤乱,至矣”;赞赏其词藻“子山之辞也俊”、“句及字之美者,则庾也”;更在总评、评点里多加推许“子山惊才盖代”、“岂特北朝一人,即亦六季鲜俪”(1591册,383页)、“最下者亦得此高亮”(1591册,407页)。激赏之意溢于言表,俨然视作情辞并重的典范。

具体而言,《采菽堂》出于对庾诗中深挚情怀的叹赏,尤重其后期诗歌,特别是《拟咏怀》系列诗,谓其“廿七首并是孤愤之诗,于中得二句‘昏昏如坐雾,漫漫疑行海’,乃子山此时情境,蕴蓄于中,倾吐而出,曾不自知语之工拙,都所不计,但取情深”(1591册,390页)。还把《拟咏怀》和阮籍的《咏怀诗》相提并论“且如咏怀一也,嗣宗第使人思,而子山则泪流漉,被面下矣。此宁可分优劣?顾能悲喜人不耳。”(《凡例》)虽然二者在风格上有不同,阮诗深沉内敛,思旨遥深,庾诗则直泄而出,倾吐全尽,“虽直率,何可废”。但庾信后期诗赋中的深情乃人所共识,所以,陈祚明推崇庾诗,更重视庾诗中“辞”的运用形式的丰富性。

庾信才气浩荡,高超的文字技巧与新颖多变的造意构思,这是陈氏倍加推扬其“辞”之处。才气大首先表现在风格多变“时不一格,屡出屡变。汇彼多方,河汉汪洋,云霞蒸荡,大气所举,浮动毫端。”(1591册,383页)也即前人所论绮艳、清新、老成,无所不备。其次,陈氏更赞赏的是其驾驭字句形式的使“辞”之才,为此特别提出两点进行剖析:其一是其使典之能“兼且学擅多闻,思心委折,使事则古今奔赴,述感则方比抽新。”(1591册,383页)庾信学识广博,娴熟史事,因此在创作中驱使典故如出己意,具有高超的用典技巧。诗评中多处指出其用典之工,如论《拟咏怀》其十二:“使事极切”;称许《和张侍中述怀》:“淋漓悲怆,使事奔凑,才如巨海一泻。”特别称赏其使事络绎不绝的奔

① 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590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79页。本文今据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590册和1591册,后引此书皆据此本,为了简明,正文中已明确者,不再注明。

② 《周书·王褒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1年,第731页。

涌才情。其二是称赏其琢句之佳。在选录庾信诗作前有一段六百多字的长评,其中近半篇幅用于称赏其造句之才能“故纷纷藉藉,名句沓来。抵鹄亦用夜光,摘蝇无非金豆。”(1591册,383页)诗评多处称许其好句之多“好句凑泊”(1591册,389页)、“真费好句不惜”(1591册,406页)。指其名句倾泻而出,给人汪洋浩瀚浑茫莫测之感。这些都是总体上带有情感的称誉。但庾诗琢句之佳具体表现在何处呢?《采菽堂》还特意从两个方面具体论究之。一是谓其有“深致”：“至其琢句之佳,又有异者。齐梁之士多以练句为工,然率以修辞矜其藻绘,纵能作致,不过轻清。夫辞非致则不睹空灵,致不深则鲜能殊创。”(1591册,383页)“致”本为魏晋六朝时期对于文艺作品具有隽永意蕴之佳评,有“致”,齐梁的诗中能手亦能达到,但却乏此“深”致。故此为庾信胜人一筹处。二是谓其构思新颖,琢句新隽“玉台以后作者相仍,所使之事易知,所运之巧相似,亮至阴子坚而极矣,稳至张正见而工矣。惟子山耸异搜奇,迴殊常格,事必远征令切,景必刻写成奇,不独暂尔标新,抑且无言不警。”(1591册,383页)学问深厚,故使典极切,才气过人,故写景奇警,发人所不能发。诗评中多举其奇警新隽之句。如论《上益州上柱国赵王二首》“棠树、褰帷,寻常事,映带境地便新。‘两江’二句亦隽”;评《镜》“影照两边人”为“此神仙语,人不解道”。指出其诗句构想新异,出人意表。若此之类,论中多有。且评中无一贬词,可见他对庾信及其诗歌推崇备至的态度。

二、对庾信诗品和人品的辩护

庾信的创作才华虽高,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。唐人广泛学习汲取庾信诗作的句律、构思,即使是倡导汉魏风骨的陈子昂也有“效小庾体”,甚至唐太宗亦有“效庾信体”,但在评价中却予以贬斥,表现出名实分离的矛盾与尴尬。对庾信的贬斥大要不出两点:一是批判徐陵、庾信的早期宫体诗风,认为其导致齐梁诗风绮靡柔弱,为亡国之音的根源;二是对庾信出仕北朝的屈节行为的批评。一为其诗品,一为其人品,对此,《采菽堂》皆予以明确的驳斥,为之辩护。庾信早年出入东宫,创作大量绮丽清艳之作,诗名已盛,评者往往以此为评价基点。如现存最早对庾信作品进行评价的宇文道为其集作序,所据虽为其魏、周时作,仍称其“妙善文词,尤工诗赋,穷缘情之

绮靡,尽体物之浏亮”^①,虽为褒许,但着眼点还是在体物工细写情丽靡的一面,并不留意其使北后的诗风变化。实际上,庾信在北朝之受称赏,正是以其早年的绮丽之风,如《周书》卷13载“赵僭王招,字豆卢突。幼聪颖,博涉群书,好属文。学庾信体,词多轻艳。”^②此至隋代及唐初并未改变,史载隋炀帝为晋王时,“尝朝京师还,作《归藩赋》,命誉为序,词甚典丽。初,王属文,为庾信体,及见誉已后,文体遂变”^③。宇文道尚以称赏为主,唐初则以为文风衰颓之罪因,卢藏用便认为“宋、齐之末,盖憔悴矣。逶迤陵颓,流靡忘返,至于徐、庾,天之将丧斯文也”^④。这也是唐初史家的一致看法。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所论最为典型,其云“梁自大同之后,雅道沦缺,渐乖典则,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,启其淫放,徐陵、庾信,分路扬镳。其意浅而繁,其文匿而彩,词尚轻险,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听,盖亦亡国之音乎!”^⑤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亦袭此论。针对前人的以偏概全,陈祚明特别强调其使北之后的诗风转变。在对庾信的长评中,完全不涉及其在南朝的创作,开篇即直接切入他的北朝际遇“北朝羁迹,实有难堪。襄汉沦亡,殊深悲痛。子山惊才盖代,身堕殊方,恨恨如忘,忽忽自失。”(1591册,383页)指出沦落北方的遭际在庾信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冲击和深刻痛苦,由此影响到其诗歌风格的转变,从绮靡轻恻的宫廷艳声转为“激楚之音,悲凉之调,情纷纠而繁会,意杂集以无端”(1591册,383页)。此外,评论还特别指出其风格多姿,“时不一格,屡出屡变。汇彼多方,河汉汪洋”(1591册,383页),提醒人们注意庾信诗风的多样性,不要偏于一端。对于庾信备受诟病的轻侧诗风,陈祚明也为其辩解。如《咏画屏风诗》其三“遥望芙蓉影,只言水底燃”,评点指出“结太尖,本谓公大家,有此不妨,不谓可学。”(1591册,405页)此结句构思新颖,但不免流于纤巧尖新,陈祚明虽承认此弊,又指出庾信为“大家”,可以作此笔法。“大家”对于明清时期的诗论家来说,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,陈祚明却不仅直呼庾为“大家”,且因此而谓其可不拘小节。可见其对庾信及其诗歌的深赏。庾信入北后诗风虽有转变,但仍保留早年讲究词藻、雕琢章句的创作习惯,他善于使典,有时不免伤于僻涩,《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》其六“含风摇古度,防露动林於。”“古度”为树,“林於”为竹,王夫之评之曰“然与他洗却脂粉,不过风摇树、露动竹而

① 庾信《庾子山集注》,倪璠注,许逸民校点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53页。

② 《周书·文闵明武宣诸子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1年,第202页。

③ 《隋书·柳彧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1423页。

④ 卢藏用《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》,《全唐文》卷238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1062页。

⑤ 《隋书》卷76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1730页。

已。俗汉定不为之喝采矣。”^①不满其使典雕饰太过,陈祚明则为之辩解“古度林於末二句使典故称僻,公大家自不妨。”(1591册402页)虽亦承认二典太生僻,仍以其为“大家”而无妨。

庾诗中不乏吟咏男女之情的诗作,持儒家诗教观的论者斥其伤于教化,此论尤以宋人为多。如孙复:“沈、谢、徐、庾,妖艳邪侈之言,杂乎其中,至有盈篇满集,发而视之,无一言及于教化者。”^②张戒“孔子删诗,取其思无邪者而已。自建安七子、六朝、有唐及近世诸人,思无邪者,惟陶渊明、杜子美耳,余皆不免落邪思也。六朝颜、鲍、徐、庾,唐李义山,国朝黄鲁直,乃邪思之尤者。”^③对此,陈祚明亦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。如评其《怨歌行》:“直道所感,悲怆情真。托辞夫妇,不得非之。”(1591册384页)指其吟咏男女之情的诗中寄托了乡关之思,别有深意,非仅“醇酒妇人”而已。又评《卫王赠桑落酒奉客》曰“少陵何酷似也。小夫不知,谓少陵以公拟李,是不满之,悲夫!”杜甫《忆李白》有“清新庾开府”句,以李白比拟庾信,后人对此众说纷纭,否定者不绝如缕。如许学夷认为“庾信五言,句法音调多似其父,而才力胜之,陈、隋诸子皆所不及,杜子美亦屡称焉。但以之比太白,则非其伦矣。”^④认为拟非其伦。陈祚明在此特别指出杜诗有酷似庾信诗风处,杜甫对庾信抱欣赏态度,以庾信比拟李白,并非是不满的表现。

庾信在诗史中的尴尬地位,其仕宦履历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在素重作者人格品德的古代诗学评价体系中,这样的经历难以获得更高的地位,特别在易代之际,更受苛评。如全祖望斥其为“无耻”,认为“失身宇文而犹指鸱首赐秦为天醉,信则已先天而醉矣,何以怨天?”^⑤因此,要提升庾信的地位,需能较为合理地解释其仕北的原因。陈祚明从庾信诗作出发,深入剖析,注意抉发其诗中流露的复杂意绪,突出其自责、愧悔的复杂心绪。如评《杨柳歌》:“篇中并是故梁之思。伤己奉使,而襄汉不全。”又评《拟咏怀》其三“知为周臣本非其志。‘倡家’二句切”;其二十一:“可知仕非得已,徒不能死,无敢不仕”;其二十三“真切,此身真如铜雀妓也”。庾信在诗中屡屡以倡家遭强聘形容身不由己的尴尬处境,如此形容,实为惨痛之言,陈氏特别择出

这类喻拟并加评点,提醒读者留意其彷徨痛苦的心境。

此外,《采菽堂》评点还侧重以比兴之法解释其乡关之思。庾信入北后的确创作了不少诗作抒发怀乡之意、悲慨之情,如《杨柳歌》、《拟咏怀》等。但并非所有作品都“篇篇有哀”,有些作品创作时间难定,而陈祚明则从其中某些字句中故作深解。如评《奉和泛江》:“感伤深远,离黍之怨,使人难窥。咏‘空巢逐树流’句,便觉都邑丘墟,鸟雀皆尽,空庐荡没,林木漂流,此景惨目。”其实,从整首诗作来看,呈现的是战舰浮江开阔雄壮的气势,陈祚明仅凭“空巢逐树流”一句便推导出国破家亡的景象,不免求之过深。评点还特别强调其不愿出仕北朝的心理,如《北园射堂新成》、《园庭》、《归田》、《望野》等诗,的确表达了归隐之意。但有时不免求之过深,甚至不惜曲为之说。如评《正旦上司宪府》“仕宦者言思钓竿,每觉有远怀。此翻言不思钓竿,更饶异趣。与‘何但食周薇’句参看,怀来自见。”认为诗中有归隐之思。但从全篇来看,描写的恰是庾信初任司宪中大夫时的踌躇自得,并非有所谓隐逸之怀。又如评《就蒲州使君乞酒》:“自比东陵公,生平无一语不自寓不臣意。每公言于当路,其节可见。虽开府周,乌得而有之?”(1591册404页)然据倪注“子山身留长安,江陵失守,随例入关者如王褒等,有数十人,愿乞此酒,分劝诸彼,自言本故梁亡国之臣,与诸南人羁土若东陵故侯矣。”^⑥又题目作“乞”字,气格本自卑下,况庾信初入北地,境况艰难,多赖北魏赏识他的王公贵戚救济,从个人情感而言,心怀感激是情理中事,不必推衍至仕隐大节。陈氏此解,也是为了强调庾信有坚贞不屈之志,自有回护庾信之意。

三、论杜甫和庾信的继承关系

陈祚明对庾信的推崇,在论述杜甫与庾信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是庾信与杜甫研究中的重要问题,唐人对此已有留意。元稹首先发现杜甫“上薄风骚,下该沈宋,言夺苏李,气吞曹刘,掩颜谢之孤高,杂徐庾之流丽,尽得古今之体势,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”^⑦的集大成特点,但其中论及杜甫对庾诗的吸收,仍着目于流丽一格,此后不少诗论家多延此论,在总体评价上,大多扬杜抑庾。如黄

① 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卷5,张国星校点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7年,第323页。

② 孙复《答张洞书》郭绍虞主编《历代文论选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396页。

③ 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,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465页。

④ 许学夷《诗源辨体》杜维沫校点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7年,第132页。

⑤ 全祖望《题袁江南赋后》,《鮑琦亭集外编》卷33,四部丛刊初编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年。

⑥ 庾信《庾子山集注》,第345页。

⑦ 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,《元氏长庆集》卷56,四部丛刊初编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年。

庭坚云“杜之诗法出审言,句法出庾信,但过之尔。”^①

在杜甫对庾信诗歌的继承问题上,陈祚明一改前人仅从“清新”“绮丽”论杜庾,注重深入发掘杜甫对庾信老成、朴拙诗风的继承。庾信诗作的“老”、“拙”,还表现在以俗事俗物入诗,明人已有先论,但评价并不高“杜子美剧喜其诗,盖其笔苍体肃,流派相合故尔。如诗才诗韵,恐未能跨越六朝”^②,认为庾信诗才并未凌跨六朝以上,且对其老拙之诗加以贬斥“庾多拙句,如‘寒山无物香’,‘秋瓜不值钱’,‘社鸡新欲伏’……真有村夫子气”。又云“‘今朝一壶酒,实是胜千金’‘阮籍披衣进,王戎含笑来’,可谓酒垆屋壁,鄙俗乃尔。”^③陈祚明对这类诗作的态度完全不同,以“新”称许之,如评《奉报穷秋寄隐士》“语语新隽”,评《归田》“何语不新?一结弥苦。”这两首诗所写都是山居隐士生活,继承陶渊明的田园诗风,褪去铅华,以其老成圆熟的笔法,写乡野事物:藜床、麦陇、涩路、坏渠、苦李、秋瓜、穿渠、烧棘,这些村俗风味的细物琐事,可以在杜甫的诗作中发现大量类似描写,但在汉魏六朝诗中是不多的。对此,陈祚明不称其拙而反以“新”论之,正是敏锐地把握了这类诗中所体现的新变特点。中唐以后兴起了俗事入诗的潮流,至宋代更是“以俗为雅”,诗论家多指出此风启自杜甫,实则庾信诗中早着先鞭。陈祚明便留意庾信这类诗作对杜甫的影响。如《卫王赠桑落酒奉客》写乡村物态,“愁人坐狭邪,喜得送流霞。跂窗催酒熟,停杯待菊花。霜风乱飘叶,寒水细澄沙。高阳今日晚,应有接篱斜”。流霞、霜风、寒水、澄沙,萧朴的景色,“乱”“细”的提炼字法,“跂窗催酒熟,停杯待菊花”宛然陶渊明平淡朴老的韵味,此诗堪称庾信老成之作,故陈氏评曰“少陵何酷似也”。深刻洞察了二者在内在神情上的一致性。

历代评论多以杜甫作为集大成的大家,广泛汲取前人成就,青出于蓝,庾信不过是其学习对象之一,地位不足与论。陈祚明在论述杜甫对庾信的继承时,则多处指出仅杜甫能得庾信真传,刻意构建二者的师承关系,以此凸显庾信作为“师”的地位。如评《咏画屏风诗》其十二“‘出没’、‘间关’字活,‘赴’字老,全为少陵窃得,它家不解用”。指出仅杜甫能得庾信之真传,他人不能窥探其中奥妙,近于禅宗的一脉真传。又如其二十三“五、六极老极幽,千古非少陵能学步,更无人得似之。”“一语作两曲,惟少陵能学之”(《赋得荷》)。“无人得似”、“他家不解用”等语,都是对庾信、

杜甫师承关系的刻意强调。杜甫的崇高地位在宋代逐渐得到确认,江西诗派奉杜甫为“祖”,明七子以杜甫为尊,而庾信作为杜甫的“前代之师”,其地位自然也得到很大的提升。就五言体本身来说,他认为庾胜于杜,所以说“庾开府诗是少陵前模,非能青出于蓝,直是亦趋亦步。独当以他体之优见异耳。若五言短律,长不复可过。”(1591册,383~384页)他认为杜甫简直对庾信“亦趋亦步”,其胜处只在其他体裁上。

在对杜甫和庾信的地位权衡中,陈祚明也表现出十分大胆的评判。高棅《唐诗品汇》以“大家”定位杜甫,《采菽堂》对庾信亦以“大家”目之“故间秀句以拙词,厕清声于洪响。浩浩泝泝,成其大家。”(1591册,383页)《唐诗品汇》分体论诗,五古、七古、五绝皆以李白为正宗,杜甫为大家,依照《唐诗品汇》正宗、大家的定位,《采菽堂》五古以汉魏诗为正宗,而以庾信为大家,无疑在古诗系统中将其地位与唐诗系统中杜甫的地位相提并论。不仅如此,评点中更多处指出庾信超卓之处,连杜甫亦不可及。或比较其字句“‘无机抱瓮汲,有道带经锄。’三四校少陵‘不贪’二句,此为高。”或以杜甫仅仅能相似而已“三四工细,结有余韵,少陵虽百炼,仅能似之。”甚至以杜甫亦不能胜之,“低徊蕴藉以抒所感,谓少陵能胜此否?”(《率尔成咏》)表现出相当的推崇之意,甚至可以说有扬庾抑杜之嫌。事实上,他着重推重庾诗的使典与练字,也正是杜甫承继庾信之处,经陈祚明若此强调指出,也是对庾杜关系的点明。

四、推崇原因

《采菽堂》对庾信的特别推崇,甚至有过誉之嫌,沈德潜便批之曰“未免扬许失实”^④。陈祚明之所以将庾信推举到“百代之师”的地位,有着多方面的原因。除了将庾诗当作情辞并重的典范,以体现其诗学观念外,下列两者当是重要原因。

(一) 知音之感

陈祚明对庾信的欣赏,某种程度上出于异代同愁的身世之感。这似乎与杜甫钟情庾信及其诗歌出于同一心理情结。庾信历经离乱,遭受亡国之痛,流落北地时,生活困窘艰苦,并非一开始便如宇文道序中所言:“戎号光隆,比仪台铉;高官美宦,有逾旧国。”^⑤实际上,庾信在西魏并未担任任何实际官职,所谓骠骑大将

① 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引,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303页。

② 冯复京《说诗补遗》,周维德集校《全明诗话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5年,第3898页。

③ 冯复京《说诗补遗》,周维德集校《全明诗话》,第3899页。

④ 沈德潜《说诗碎语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年,第205页。

⑤ 庾信《庾子山集注》,第53页。

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皆为虚衔。至北周孝闵帝时任司水下大夫,官秩低微,后出为弘农郡守,也是僻处周齐边境,仕宦并不得意。在实际生活中,庾信常陷于困窘,多赖诸王接济,诗作中也有反映,如《小园赋》:“聚空仓而雀噪,惊懒妇而蝉嘶。”历来评论者多留意庾诗中清丽绮靡的宫体诗作,对这类朴拙诗句,或略而不及,或不屑评之。陈祚明则能注意到庾信在北生活的苦况,特加点明“以上篇五、六二句演出直序,足知在北之苦”,“每惠酒,便作异常感,语刻在外,苦况可知。”(《奉答赐酒鹅》)能看到庾信为人所不察觉的困窘一面,这当与陈祚明自身经历有关。陈氏在明亡后偕母隐居,后为生计,入京游于公卿之间,其《稽留山人集》中的不少诗歌都表达了“流寓京华的苦乐忧辛,诗酒酬酢之外的失意忧伤”^①,《偶吟十二首》其七更直接将自己的境况与庾信相类比“诗酒陶潜活,江山庾信悲。毕生行乞食,垂白弃妻儿。”^②类似的境遇,当令陈祚明对其抱有特别同情之意,更何况陈氏还有或多或少的明代遗民之感。

或许正因为重视身世遭际对于诗歌的作用,陈祚明论诗还很重视世运时势的影响。庾信由南入北的特殊经历,恰恰为其创作增加了厚重感。《采菽堂》在比较鲍照和庾信时指出“所微嫌者,识解未深,寄托亦浅……百首等情,乌睹殊解,无烦诠释,莫足耽思。”(1591册,157页)认为鲍诗意蕴不如庾诗深厚,正在于缺乏庾信的特殊经历,因而在情感上也不如其深沉,诗歌成就亦逊之(1591册,157页)。又评《重别周尚书》:“唐人纵师其意,不若公处其时,情真语自独绝。”也是从时世的角度立论,认为唐人无此经历自然无此深厚情感。特殊的遭际赋予了庾信诗作深刻的情感体验与深厚意蕴,这种主观体验式的品评其实也有自身的身世之感。如果比较与他同时而稍后的主流学者王士禛《古诗选》的“古诗”倾向,这种身世之感将更加明显。

(二) 六朝诗史的建构意图

《采菽堂》推崇庾信,还包含为六朝诗正名,重新建构六朝诗史的意图。初唐史家将徐庾等人的早期绮艳诗风定为亡国之音,称之为“词赋之罪人”^③,或偶有同情其遭遇者,但难掩众口之非,由此形成某种惯性评价。明代宋濂《答章秀才论诗书》云初唐诗歌“承陈隋之弊,多遵徐、庾,遂至颓靡不振”^④,认为正是由于初

唐诗歌承袭了徐庾诗风,才至颓靡不振。前后七子以复古相号召,古诗必汉魏,更是将六朝诗贬斥在外。为反拨此种偏颇,明代中期已兴起一股学习六朝诗的风尚,认为“六朝之诗,多是乐府,绝句之体未纯,然高妙奇丽,良不可及。泝流而不穷其源,可乎?”^⑤指出六朝亦为唐人之源。杨慎等虽对庾信评价甚高,却从未有如陈氏以具体诗选而为之张目。

陈祚明继承明代六朝派余绪,为纠正复古派完全排斥六朝诗的偏颇,在《凡例》中申明“古诗”的含义:“古诗自汉迄隋代远矣,大抵多五言;齐、梁稍趋之律。学者概目为古诗,与近体判然,是近体之源也。”把齐梁诗也纳入“古诗”之中,并且明确指出是“近体之源”。由此进一步指出“初、盛唐密迩六朝,人各有所宗法,如陶、谢、庾、鲍、阴、何,自太白、少陵覆瓿于兹,故所诣卓。中、晚之衰也,即奉唐人为典型,故调益靡。”在评点中,陈祚明多处为庾信鸣不平“庾子山才不下少陵,今人莫知者,悲夫”(《凡例》)“有如此典切。悲痛语,千古人不解称颂,何也?杜少陵佳诗有几,便复脍炙人口。”(《拟咏怀》其八)认为时人拘于成见,对六朝诗一概加以贬斥,以致遗漏了许多优秀作品。庾信作为集南北文风之大成的作家,因受六朝恶名之累难以获得客观公正的评价,通过推举庾信,也就达到为六朝诗正名的目的,这也是庾信受到陈祚明推崇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在庾信诗歌接受史上,一直呈现某种褒贬不一或评价暧昧的态势。陈祚明对庾信的评价,虽有部分夸大之处,如过分强调了庾诗的内蕴和不愿出仕北朝的志节,在杜甫和庾信的比较中亦有扬庾抑杜之嫌,未必令人认同。但陈氏在选诗中打破偏见,对庾信诗风进行多向度的挖掘探索,有助于全面认识庾信的诗歌风貌;在理论上大胆为庾信正名,称许为“大家”,以整体的眼光为庾信及其诗歌定位,由此开启清人的再审视与再评价,这在庾信接受史上有重要意义,也对此后一些古诗选本与古诗理论(如沈德潜、李调元、刘熙载等)有一定影响。此外,对于纠正明代前后七子过分贬低六朝诗歌之弊,把七子派所摒弃的六朝诗重新纳入诗史,促进清人对六朝诗的全面审视与关注,起了重要的先导意义。甚至可以说,对近代六朝学的兴起亦有借重之用。

责任编辑:刘云

① 陈斌《陈祚明交游及〈采菽堂古诗选〉编选意图考论》,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4期。

② 陈祚明《稽留山人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233册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。

③ 《周书·庾信传论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1年,第744页。

④ 宋濂《答章秀才论诗书》,《宋学士全集》卷28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051页。

⑤ 杨慎《升庵诗话新笺证》,王大厚笺证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133页。